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总主编 王洪君 郭锐 刘云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寻 津 录

「英」威妥玛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

主编 刘云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

分卷主编

翟赞 郭利霞 陈颖

寻 津 录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英」威妥玛
编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寻津录 / (英) 威妥玛编著. — 影印本. —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7.7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

ISBN 978-7-301-28500-8

I. ①寻… II. ①威… III. ①汉语—近代—研究 IV. ①H109.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61663号

- 书 名 寻津录(影印本)
XUNJINLU (YINGYIN BEN)
著作责任者 [英] 威妥玛 编著
责任编辑 孙 娴 路冬月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8500-8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zpup@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3374
印 刷 者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72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19.25印张
2017年8月第1版 2017年8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76.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

总 序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化的载体。语言中有历史。

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体现在我国丰富的民族文化和地域文化及其语言和方言之中。

北京是辽金元明清五代国都(辽时为陪都),千余年来,逐渐成为中华民族所公认的政治中心。北方多个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在这里碰撞、融合,产生出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带有民族文化风味的特色文化。

现今的北京话是我国汉语方言和地域文化中极具特色的一支,它与辽金元明四代的北京话是否有直接继承关系还不是十分清楚。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与清代以来旗人语言文化与汉人语言文化的彼此交融有直接关系。再往前追溯,旗人与汉人语言文化的接触与交融在入关前已经十分深刻。本丛书收集整理的这些语料直接反映了清代以来北京话、京味文化的发展变化。

早期北京话有独特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底蕴,于中华文化、历史有特别的意义。

一者,这一时期的北京历经满汉双语共存、双语互协而新生出的汉语方言——北京话,她最终成为我国民族共同语(普通话)的基础方言。这一过程是中华多元一体文化自然形成的诸过程之一,对于了解形成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关系的具体进程有重要的价值。

二者,清代以来,北京曾历经数次重要的社会变动:清王朝的逐渐孱弱、八国联军的入侵、帝制覆灭和民国建立及其伴随的满汉关系变化、各路军阀的来来往往、日本侵略者的占领,等等。在这些不同的社会环境下,北京人的构成有无重要变化?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是否有变化?进一步地,地域方言和文化与自身的传承性或发展性有着什么样的关系?与社会变迁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清代以至民国时期早期北京话的语料为研究语言文化自身传承性与社

会的关系提供了很好的素材。

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把握未来。新中国成立后,北京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是全国的文化和科研中心,新的北京话和京味文化或正在形成。什么是老北京京味文化的精华?如何传承这些精华?为把握新的地域文化形成的规律,为传承地域文化的精华,必须对过去的地域文化的特色及其形成过程进行细致的研究和理性的分析。而近几十年来,各种新的传媒形式不断涌现,外来西方文化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的冲击越来越强烈,北京地区人口流动日趋频繁,老北京人逐渐分散,老北京话已几近消失。清代以来各个重要历史时期早期北京话语料的保护整理和研究迫在眉睫。

“早期北京话珍本典籍校释与研究(暨早期北京话文献数字化工程)”是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 中心研究成果,由“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早期北京话数据库”和“早期北京话研究书系”三部分组成。“集成”收录从清中叶到民国末年反映早期北京话面貌的珍稀文献并对内容加以整理,“数据库”为研究者分析语料提供便利,“研究书系”是在上述文献和数据库基础上对早期北京话的集中研究,反映了当前相关研究的最新进展。

本丛书可以为语言学、历史学、社会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方面的研究提供素材。

愿本丛书的出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做出贡献!

王洪君、郭锐、刘云

2016年10月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序

清民两代是北京话走向成熟的关键阶段。从汉语史的角度看，这是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而成熟后的北京话又开始为当代汉民族共同语——普通话源源不断地提供着养分。蒋绍愚先生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

“特别是清初到19世纪末这一段的汉语，虽然按分期来说是属于现代汉语而不属于近代汉语，但这一段的语言（语法，尤其是词汇）和‘五四’以后的语言（通常所说的‘现代汉语’就是指‘五四’以后的语言）还有若干不同，研究这一段语言对于研究近代汉语是如何发展到‘五四’以后的语言是很有价值的。”（《近代汉语研究概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然而国内的早期北京话研究并不尽如人意，在重视程度和材料发掘力度上都要落后于日本同行。自1876年至1945年间，日本汉语教学的目的语转向当时的北京话，因此留下了大批的北京话教材，这为其早期北京话研究提供了材料支撑。作为日本北京话研究的奠基者，太田辰夫先生非常重视新语料的发掘，很早就利用了《小额》《北京》等京味儿小说材料。这种治学理念得到了很好的传承，之后，日本陆续影印出版了《中国语学资料丛刊》《中国语教本类集成》《清民语料》等资料汇编，给研究带来了便利。

新材料的发掘是学术研究的源头活水。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有云：“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我们的研究要想取得突破，必须打破材料桎梏。在具体思路上，一方面要拓展视野，关注“异族之故书”，深度利用好朝鲜、日本、泰西诸国作者所主导编纂的早期北京话教本；另一方面，更要利用本土优势，在“吾国之旧籍”中深入挖掘，官话正音教本、满汉合璧教本、京味儿小说、曲艺剧本等新类型语料大有文章可做。在明确了思路之后，我们从2004年开始了前期的准备工作，在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大力支

持下,早期北京话的挖掘整理工作于2007年正式启动。本次推出的“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是阶段性成果之一,总体设计上“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共分“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十全福”“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八个系列,胪列如下:

“日本北京话教科书汇编”于日本早期北京话会话书、综合教科书、改编读物和风俗纪闻读物中精选出《燕京妇语》《四声联珠》《华语跬步》《官话指南》《改订官话指南》《亚细亚言语集》《京华事略》《北京纪闻》《北京风土编》《北京风俗问答》《北京事情》《伊苏普喻言》《搜奇新编》《今古奇观》等二十余部作品。这些教材是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缩影,也是研究早期北京方言、民俗、史地问题的宝贵资料。本系列的编纂得到了日本学界的大力帮助。冰野善宽、内田庆市、太田斋、罇泽彰夫诸先生在书影拍摄方面给予了诸多帮助。书中日语例言、日语小引的翻译得到了竹越孝先生的悉心指导,在此深表谢忱。

“朝鲜日据时期汉语会话书汇编”由韩国著名汉学家朴在渊教授和金雅瑛博士校注,收入《改正增补汉语独学》《修正独习汉语指南》《高等官话华语精选》《官话华语教范》《速修汉语自通》《速修汉语大成》《无先生速修中国语自通》《官话标准:短期速修中国语自通》《中语大全》《“内鲜满”最速成中国语自通》等十余部日据时期(1910年至1945年)朝鲜教材。这批教材既是对《老乞大》《朴通事》的传承,又深受日本早期北京话教学活动的影响。在中韩语言史、文化史研究中,日据时期是近现代过渡的重要时期,这些资料具有多方面的研究价值。

“西人北京话教科书汇编”收录了《语言自述集》《官话类编》等十余部西人主编教材。这些西方作者多受过语言学训练,他们用印欧语的眼光考量汉语,解释汉语语法现象,设计记音符号系统,对早期北京话语音、词汇、语法面貌的描写要比本土文献更为精准。感谢郭锐老师提供了《官话类编》《北京话语音读本》和《汉语口语初级读本》的底本,《寻津录》、《语言自述集》(第一版、第二版)、《汉英北京官话词汇》、《华语入门》等底本由北京大学

图书馆特藏部提供,谨致谢忱。《华英文义津逮》《言语声片》为笔者从海外购回,其中最为珍贵的是老舍先生在伦敦东方学院执教期间,与英国学者共同编写的教材——《言语声片》。教材共分两卷:第一卷为英文卷,用英语讲授汉语,用音标标注课文的读音;第二卷为汉字卷。《言语声片》采用先用英语导入,再学习汉字的教学方法讲授汉语口语,是世界上第一部有声汉语教材。书中汉字均由老舍先生亲笔书写,全书由老舍先生录音,共十六张唱片,京韵十足,殊为珍贵。

上述三类“异族之故书”经江蓝生、张卫东、汪维辉、张美兰、李无未、王顺洪、张西平、鲁健骥、王澧华诸先生介绍,已经进入学界视野,对北京话研究和对外汉语教学史研究产生了很大的推动作用。我们希望将更多的域外经典北京话教本引入进来,考虑到日本卷和朝鲜卷中很多抄本字迹潦草,难以辨认,而刻本、印本中也存在着大量的异体字和俗字,重排点校注释的出版形式更利于研究者利用,这也是前文“深度利用”的含义所在。

对“吾国之旧籍”挖掘整理的成果,则体现在下面五个系列中:

“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收入《清文启蒙》《清话问答四十条》《清文指要》《续编兼汉清文指要》《庸言知旨》《满汉成语对待》《清文接字》《重刻清文虚字指南编》等十余部经典满汉合璧文献。入关以后,在汉语这一强势语言的影响下,熟习满语的满人越来越少,故雍正以降,出现了一批用当时的北京话注释翻译的满语会话书和语法书。这批教科书的目的本是教授旗人学习满语,却无意中成为了早期北京话的珍贵记录。“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首次对这批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整理,不仅对北京话溯源和满汉语言接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将为满语研究和满语教学创造极大便利。由于底本多为善本古籍,研究者不易见到,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古籍部和日本神户外国语大学竹越孝教授的大力协助下,“萃编”将以重排点校加影印的形式出版。

“清代官话正音文献”收入《正音撮要》(高静亭著)和《正音咀华》(莎彝尊著)两种代表著作。雍正六年(1728),雍正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福建为此还专门设立了正音书馆。这一“正音”运动的直接影响就是以《正音撮要》和《正音咀华》为代表的一批官话正音教材的问世。这些书的作者或为旗人,或寓居京城多年,书中保留着大量北京话词汇和口语材料,具有极高

的研究价值。沈国威先生和侯兴泉先生对底本搜集助力良多,特此致谢。

《十全福》是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程砚秋玉霜簪戏曲珍本》之一种,为同治元年陈金雀抄本。陈晓博士发现该传奇虽为昆腔戏,念白却多为京话,较为罕见。

以上三个系列均为古籍,且不乏善本,研究者不容易接触到,因此我们提供了影印全文。总体来说,由于言文不一,清代的本土北京话语料数量较少。而到了清末民初,风气渐开,情况有了很大变化。彭翼仲、文实权、蔡友梅等一批北京爱国知识分子通过开办白话报来“开启民智”“改良社会”。著名爱国报人彭翼仲在《京话日报》的发刊词中这样写道:“本报为输进文明、改良风俗,以开通社会多数人之智识为宗旨。故通幅概用京话,以浅显之笔,达朴实之理,纪紧要之事,务令雅俗共赏,妇稚咸宜。”在当时北京白话报刊的诸多栏目中,最受市民欢迎的当属京味儿小说连载和《益世余谭》之类的评论栏目,语言极为地道。

“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首次对以蔡友梅、冷佛、徐剑胆、儒丐、勋锐为代表的晚清民国京味儿作家群及作品进行系统挖掘和整理,从千余部京味儿小说中萃取代表作家的代表作品,并加以点校注释。该作家群活跃于清末民初,以报纸为阵地,以小说为工具,开展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底层启蒙运动,为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打下了一定的群众基础,他们的作品对老舍等京味儿小说大家的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本系列的问世亦将为文学史和思想史研究提供议题。于润琦、方梅、陈清茹、雷晓彤诸先生为本系列提供了部分底本或馆藏线索,首都图书馆历史文献阅览室、天津图书馆、国家图书馆提供了极大便利,谨致谢意!

“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则收入《益世余谭》和《益世余墨》,均系著名京味儿小说家蔡友梅在民初报章上发表的专栏时评,由日本岐阜圣德学园大学刘一之教授、矢野贺子教授校注。

这一时期存世的报载北京话语料口语化程度高,且总量庞大,但发掘和整理却殊为不易,称得上“珍稀”二字。一方面,由于报载小说等栏目的流行,外地作者也加入了京味儿小说创作行列,五花八门的笔名背后还需考证作者是否为京籍,以蔡友梅为例,其真名为蔡松龄,查明的笔名还有损、损公、退

化、亦我、梅菟、老梅、今睿等。另一方面，这些作者的作品多为急就章，文字错讹很多，并且鲜有单行本存世，老报纸残损老化的情况日益严重，整理的难度可想而知。

上述八个系列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相关领域的空白。由于各个系列在内容、体例、出版年代和出版形式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我们在整理时借鉴《朝鲜时代汉语教科书丛刊续编》《〈清文指要〉汇校与语言研究》等语言类古籍的整理体例，结合各个系列自身特点和读者需求，灵活制定体例。“清末民初京味儿小说书系”和“清末民初京味儿时评书系”年代较近，读者群体更为广泛，经过多方调研和反复讨论，我们决定在整理时使用简体横排的形式，尽可能同时满足专业研究者和普通读者的需求。“清代满汉合璧文献萃编”“清代官话正音文献”等系列整理时则采用繁体。“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总计六十余册，总字数近千万字，称得上是工程浩大，由于我们能力有限，体例和校注中难免会有疏漏，加之受客观条件所限，一些拟定的重要书目本次无法收入，还望读者多多谅解。

“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可以说是中日韩三国学者通力合作的结晶，得到了方方面面的帮助，我们还要感谢陆俭明、马真、蒋绍愚、江蓝生、崔希亮、方梅、张美兰、陈前瑞、赵日新、陈跃红、徐大军、张世方、李明、邓如冰、王强、陈保新诸先生的大力支持，感谢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协助以及萧群书记的热心协调。“集成”的编纂队伍以青年学者为主，经验不足，两位丛书总主编倾注了大量心血。王洪君老师不仅在经费和资料上提供保障，还积极扶掖新进，“我们搭台，你们年轻人唱戏”的话语令人倍感温暖和鼓舞。郭锐老师在经费和人员上也予以了大力支持，不仅对体例制定、底本选定等具体工作进行了细致指导，还无私地将自己发现的新材料和新课题与大家分享，令人钦佩。“集成”能够顺利出版还要特别感谢国家出版基金规划管理办公室的支持以及北京大学出版社王明舟社长、张凤珠副总编的精心策划，感谢汉语编辑室杜若明、邓晓霞、张弘泓、宋立文等老师所付出的辛劳。需要感谢的师友还有很多，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我们不奢望引领“时代学术之新

潮流”，惟愿能给研究者带来一些便利，免去一些奔波之苦，这也是我们向所有关心帮助过“早期北京话珍稀文献集成”的人士致以的最诚挚的谢意。

刘 云

2015年6月23日

于对外经贸大学求索楼

2016年4月19日

改定于润泽公馆

导 读

陈 颖 姚 澜

清代末年国门打开,随着对外交流程度的加深,汉语作为第二语言的教学逐渐受到重视,尤其是传教士,出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从事汉语教学,进而编写汉语教材。这些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语言面貌及汉语教学情况,对语言本体、汉语史、汉语习得等方面的研究都有重要意义。

二十世纪末,人们注意到了英国传教士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的《语言自述集》,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述集〉所记的北京音系》(1998)、高晓虹和刘淑学《〈语言自述集〉中的入声字读音》(2006)、张美兰《〈语言自述集〉中的清末北京话口语词及其贡献》(2007)、党静鹏《〈语言自述集〉的词汇学价值》(2011)、宋桔《〈语言自述集〉的文献和语法研究》(2011)等,分别对其进行了语音、词汇、语法等方面的研究。而威妥玛的第一本汉语教材《寻津录》却鲜为人知,本文对其体例略作梳理,以期一斑窥豹。

一、威妥玛及其著作《寻津录》

威妥玛是清朝末期一位极具影响力的英国外交官,以“威妥玛式注音法”闻名于世。据Cooley, James C., Jr. *T.F. Wade in China: Pioneer in Global Diplomacy 1842—1882*记载,威妥玛是在1841年来华的船上学习的汉语,到达香港之时,船上仅有他能说汉语,于是被立即任命为翻译。由于驻地和所

参与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最初威氏所学所讲的都是广东话。他借助语言优势和出色的外交能力，1845年任香港最高法院广东话翻译，1852年任上海副领事，1854年任上海海关税务司。由于仕途的不断发展，威氏意识到自己所说的广东话有很大的局限性。他在《寻津录》的前言中提到：“Meadows先生早在1844年就告诉我们，在广东那样较远省份的政府机构里，231人中就有74个是北京人，还有15个来自直隶省。广州近来发行的一本官话教材中，好些音节的拼写法已经完全改变了，听起来像是北京话。毫无疑问，北京话已经是官方译员必须学习的内容。”

威妥玛注意到当时的翻译工作存在很多问题，辞去了上海海关的工作回到香港，开始培养来华的见习翻译，也开始了他一系列汉语教材的编写之路。

而在此之前，已经有不少西方学者开始从事汉语教学或者汉语教材编写，其中大多数是传教士，比如17世纪中期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中国文法》、西班牙人瓦罗《华语官话语法》（1703）、马士曼《中国言法》（1814）、马礼逊《汉语语法》（1815）、雷慕萨《汉文启蒙》（1822）、洪堡特《论汉语的语法结构》（1826）、马约瑟《汉语札记》（1831）等（李无未 2008）。

在这些汉语教材的基础上，威妥玛编写了以介绍北京口语为主要内容的汉语教材《寻津录》，1859年在香港出版，“此书成为威氏开始着手定制汉语拉丁字母注音方法的标志”（宋桔 2011：43），正如他在此书封面所写：“Being the First of A Series of Contribution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这本书是他编写的第一本教材，此后还陆续编写了《问答篇》（1860）、《登瀛篇》（1860）以及《语言自述集》（1867）。

威氏于1883年回国，1888年被任命为剑桥大学首席汉学教授（宋桔 2011：44）。他在中国生活了43年之久，是19世纪中期北京话的权威见证者

和记录者。《寻津录》中记载了北京话各类语言现象，也包含了威氏对这些现象的认识和理解。书名的“津”是渡口之义，所以书名又叫 *Writing of One in Search of a Ford*。威妥玛说：书名的意思是说，这不仅仅是为寻找正确方法的人提供帮助的参考书。并在扉页上引用了“泰山不让土壤，河海不择细流”鼓励学生通过坚持不懈的练习来获得较高的汉语水平。

《寻津录》一书分为三册，第一册是英文文本，除了前言和勘误表，主要内容是对天类、圣谕广训、练习三个部分的注释；第二册是中文文本，故而采用中式装帧，右侧装订，从右到左竖行书写，每个字右侧用拉丁字母标注读音，句末有逗号或句号，包括天类、圣谕广训、练习这三个部分；第三册是配套的据四声编排的北京话音节表。此次所用影印本系北京大学图书馆特藏部所藏，上海图书馆徐家汇所藏版本将第一、二册合为一本。

二、《寻津录》体例一览

（一）天类

这一部分共有362个汉语句，都跟“天”有关，故名“天类”。句子中的“天”有以下四种意思：①“地面以上的高空”，如“轻气上浮的就是天”；②“季节”，如“春天，犯潮的时候儿……”；③“日、一昼夜”，如“只怕三天里头，就有大风咯”；④“神仙居住的地方”，如“人的存心好歹，再瞒不过头上的天”。1—320句是关于气象和神明的描述，以独白形式出现。321—362句是作者跟老师的讨论，以问答形式对比中国和西方的神仙。

以第33句为例：

第二册中文文本中的句子：

33. 鸡叫后，天还不大亮，看人分不出眉眼儿来的时候儿，就是黑姑冬。

第一册对对应句子进行英文注释：先意译；然后Lit. 部分是逐词对译；Obs. 部分是解释汉语句子及英语翻译中的重要内容。

33. 'Hei ku-tung is the time after cock-crow, but before it is light enough to tell a man's eyes from his eye-brows; (to distinguish a man's features.)

首先意译全句内容。先将“分不出眉眼儿来”译为“不能将眉毛和眼睛区分开来”，随后在括号内解释为“分辨某人的面貌”。

Lit. The fowls-cry after,—the heaven still not of a great brightness,—beholding a man there is no distinguishing eye-brow and eye—'s time, —then, or accordingly, is it 'hei ku tung.

Lit. 为 Literalness（字面意思）的缩写，这一段完全不考虑英语语法规则，逐词对译。

Obs. 1. By the influence of ti, all the words preceding it are grouped into attributives of shih—'hou, time. 2. 'hai also read 'huan. 3. h'an jên looking at a man [you] fên-pu-ch'u, divide not out; father reinforced by lai to come, which follows mei yen, eye-brows and eyes, the object of fên, to distinguish. 4. 'hei black, dark; ku tung appears to be almost a vulgarity.

Obs. 为 Observation（观察）的缩写，对汉语句子及英语翻译中重要的语音、词汇、语法、短语和民俗等内容进行解释。该段分别讨论了“的”字结构、“还”的读音、“看人分不出眉眼儿来”的含义、以及“黑姑冬”这个方言词。

第二册中文文本中的每个汉语句子在第一册中都有对应的英文翻译，有时会省略 Lit. 或 Obs.。结构简单、句义明确的句子只出现 Lit. 部分，没有注解。结构较为复杂、涉及更多汉语语法现象的句子则只出现 Obs. 部分，省去了不必要的字面意思解释，直接进入对这些语法现象的详细注解。如果句子的意思直白易懂，又没有生僻的字词或复杂的句子结构，则将 Lit. 和 Obs.

都省去。

（二）圣谕广训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载：“《圣谕广训》一卷：谨案《圣谕》十六条，圣祖仁皇帝所颁。《广训》一万余言，则我世宗宪皇帝推绎圣谕以垂范奕世者也。”内容包括康熙《圣谕十六条》和雍正据之推演而出的《广训》两个部分，均以文言写成。由于清政府大力推广，坊间有不少白话版本以助宣教，其中王又朴《圣谕广训衍》影响很大。王又朴（1681—？），天津人，雍正元年（1723）进士。《圣谕广训衍》全书约3.1万字，撰于雍正四年（1726）（张艳珍 2008），采用北京口语编写，浅显易懂。

威氏说：“本书中的《圣谕广训》是前盐运官员王又朴用北京口语编写的，这里选取了他的第一章，如上所述有所改动，故为方便汉语学习者进行了翻译。”威氏所说的“改动”是指只选用了王氏衍说圣谕十六条中的第一条“敦孝弟以重人伦”的内容，安排在第二册“圣谕广训”部分中，中文文本近3000字，共44句。并且威氏在王氏衍说的基础上调整了个别字词。如《圣谕广训衍说》粤东省西湖街甘艺苑楼重刊本^①：“怎么是孝呢，者个孝顺的道理大得紧，上而天，下而地，中间的人，没有一个离了者个理的。”威氏对应文本为“怎么是孝呢？这个孝顺的道理大得狠，上至天，下至地，中间儿的人，没有一个离了这个道理的。”

第一册英文文本“圣谕广训”包括五部分内容：

1. 介绍《圣谕广训》第一章内容对于传教士的积极作用、该书的源流推广情况及采用王又朴（Wang yü-po）的衍说版本等情况。

^① 光绪戊申本（1908）《圣谕广训衍说》云南道监察御史吴鸿恩题跋：“鸿恩习举业时，敬承庭训，每月朔望与学中人宣讲圣谕。近年忝主愿，学堂讲席谆谆以此诲诸生。旧存《衍说》一编，乃前任陕西盐运同臣王又朴所著，明白晓畅，妇孺皆知。鸿恩去秋奉命巡视中城，屡见愚民作奸犯科而不为怪，思有以化导之，具疏申明旧章。”